
政治分组讨论概要

主持人 砂山幸雄 (SUNAYAMA Yukio)

本分组讨论旨在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发生的质变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和民主化的前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政治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但在全球化飞速进展、美国的一极国际秩序愈发明显的今天，经济优先的改革路线似乎逐渐到达了某个临界点。如何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相应地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中的障碍和困难在哪里，为了讨论这些课题，我们邀请了分处太平洋两岸却都在研究对方的知名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Richard Baum 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来做我们这个讨论的主题报告，在此基础上还有 5 名国内外的学者作为评论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以研究邓小平时代政治运作过程知名的 Baum 教授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取得一定成功的政治因素及其界限作了以下分析。邓小平把在消费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就开始政治自由化、导致了人民爆发不满的波兰作为反面教材，将通过经济增长使人人受惠作为至上命题，并以此封住了政治改革的诉求。但是现在经济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失业、贫富差距的加剧、腐败问题等）使邓小平的战略出现了破绽。尽管可以把共产党的一党支配体制比喻为能够强有力地控制社会的大拇指，但是由于其缺乏可以确切感触到来自社会反应的敏感的“（大拇指以外的）手指”，所以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就出现过激反应。镇压法轮功以及向公开非典疫情扩大的人士施压就属于这种情况。今天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些纤细敏感的“（大拇指以外的）手指”，就是将社会上多样化了的意见和利益也融汇 (input) 到政治过程中，将反馈机制制度化。在这里，进行融汇 (input) 的一方是以自治为前提的，活用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党派等“统一战线”下的组织的做法是代替不了的。Baum 教授主张眼前并不希望出现实行多党制和分权制的要求，而是有必要将利益的多元化和意见的多样化体现在能够进行反馈的机制中，（政治制度）向“温和的权威主义”演化。

另外一位主题报告者时殷弘教授作为最近在中日两国间引起争论的对日“新思维”外交政策的提倡者之一受到了关注，但时教授也是有名的研究美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学者。时教授在引用了鲍威尔国务卿“现在的中美关系是过去30年间最好的”的讲话后，认为两国关系并不是因反恐而出现的一时性改善，而是中国从9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总体性的外交“大战略”的成果。时教授认为这个“大战略”经过调整，逐渐从当初片面、充满矛盾演变为自信和主动。特别是1999年美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随着9·11事件美国对恐怖主义实行强硬政策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美政策出现了执行持稳健路线的“巨变”，这实际上是过去15年间中国通过学习得出的“现实主义的理解、谨慎的乐观主义和战略性的思考”的结果。

时教授对中国把稳健的对美政策置于其“大战略”的中心位置给与了高度评价，同时也

认为中国实际上将军事现代化和阻止台湾独立也置于很高的战略位置，并称之为“双头战略”。时教授还认为与美国以外的主要大国、特别是改善对日关系、以平衡对美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主张尽管中国（的政策）还存在各种悖论，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为了维护一个稳定的对美关系而实行稳健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大战略”。

根据主办者的请求，各位评论员就与上述两位的主题报告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发言。朱光磊教授（南开大学政法学院院长）表明了与 Baum 教授的主题报告相反的观点。朱教授认为现在中国处在“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来建立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城市中间阶层）。Baum 教授认为为了适应中国的变化共产党的统治职能应该转变，而朱教授认为一定要稳定地推进社会的进一步变化，为此政治改革应该优先实现“党内民主”。对于朱教授的主张，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认为共产党促使资本家入党可能是利益多元化的表现，可是谁来代表农民和劳动者的利益呢？如果坚持目前优先发展沿海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个（三个代表）理论现在就很难反映在选举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利益，国分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现行体制下中国进行民主化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中还包含着文明论的课题，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研究员对儒教文明是阻碍民主化的要因这一常年的定论——近年来还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利用过——提出了异议，郑研究员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历经多个政治体制仍生息不止的成熟的价值体系，它本身并不能说是反民主的，问题在于总是在利用传统文化的政治势力，比如最近中国最高层提倡的“德治”（的做法）。郑研究员试图脱离政治谈论儒家文化的历史持续性，而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则将文化相对主义扩展到政治领域，挑战性地提出了“政治文明论”，赵教授主张，与其用西方的标准判断中国的政治，中国不如在接受外来文明影响的同时继承传统、重视“中华文明主流”（文明）的自主性的发展。最近中国共产党向“中华党”或“全民党”的转变、“精英”们提出的“党内民主”等这些举动可说是和西方民主主义价值观不同的“民主”，如果按照赵教授的观点，不仅 Baum 教授、就是朱教授也是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政治的。

针对时殷弘教授的主题报告，有学者从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其进行补充和提出了疑问。国分教授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与外界协调，是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程度增高密不可分的，并列举了贸易在 GDP 中的比例、在税收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等具体数据。另外，还有意见认为，中国对美协调外交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因为战略利益（的一致）中美间的国家关系可能会稳定，但双方在是否拥有共同价值观念这个重要因素上仍然止步不前。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教授结合 Baum 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外交的政策制定中缺乏反馈机制，因此有可能无法有效控制国内针对美关系的协调政策和对日关系的“新思考”出现的反对势头。加加美教授进一步提到，如同美国宣扬自由与民主主义的信念与 9·11 事件后在美国国内高涨的爱国主义之间表现出来的典型的“普遍主义与单独主义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中国民主化被不断拖延”的原因。赵宏伟教授对时殷弘教授的发言也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近年中美关系的改善全部是中国方面努力的结果的话，那么可不可可以说现在处于最

低潮的中日关系也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不足导致的呢？

在评论后进行的讨论中成为焦点的问题之一就是朱光磊教授提出的中国的民主化要随着城市中间阶层的成长逐步实现的正统观点。对此加加美教授认为，即使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通过电视等媒体一样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世界，在中国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力量交杂在一起、互相作用，因此，以实现顺利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为前提的古典阶级划分理论就存在无法对现状进行解读的部分。对加加美教授的疑问，朱教授承认在中国、信息的传输确实逐渐变得多元化，但是更应注意到主要的传输渠道还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之下。有关这个问题，郑研究员也认为反馈机能即使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仍然存在并对体制的存续发挥着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时殷弘教授主张的美中关系的改善。对此，国分教授已经指出看上去良好的两国关系背后所潜藏着的问题，加加美教授也提到了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包含的普遍主义与单边主义共存的矛盾。讨论中赵宏伟教授认为，1995年江泽民提出的“新安全观”实际上旨在改变邓小平的不结盟政策，试图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集体安全机制，这与美国（以及与之合作的日本）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建立的动向之间是存在衔接点的。针对这些评论和意见，时教授认为应该注重1999年以后（中国外交）的变化，从中可以观察到江泽民的“学习过程”。根据时教授的见解，在中国看来，朝鲜核开发问题最初只是短期的一时性的危机，但是今天却有可能通过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并建立东北亚的多边安全机制。

很遗憾由于时间紧迫，很多提到的重要问题无法更进一步地探讨，但是通过这次讨论，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当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和维持现行体制的运作所推行的对内对外战略以及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和面对的困难。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的 ICCS 的研究活动中作进一步的探讨。

(刘星 译)